



# 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三) 兽面纹大鼎(下)

◆ 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海外收藏的兽面纹大鼎,远不止此前所说的子龙鼎、夔鼎两件。收藏子龙鼎、夔鼎的藏家千石唯司、坂本五郎,甚至还各收藏有一件略小的兽面纹大鼎。瑞士苏黎世的瑞特堡博物馆(Museum Rietberg)收藏有一件器形、纹饰与子龙鼎几乎完全相同的兽面纹大鼎。目前仅在海外所见的兽面纹大鼎,数量即在十件以上。这些鼎仍然一如子龙鼎、夔鼎一样的形制,虽然他们的形体稍小,但与一般青铜鼎相较,仍然明显高大许多。

由于兽面纹大鼎的年代,大都集中于晚商到西周早期一段时间,其形制多较为接近。它们的差异,较明显的区别在于纹饰:虽然都在口下装饰一周兽面纹,但兽面纹的布局也都存在子龙鼎和大盂鼎那样的不同:一周兽面纹的组数分别为三组和六组。以下我们就按照一周三组长躯兽面纹和一周六组兽面纹的不同,分别介绍这些兽面纹大鼎。

一周三组长躯兽面纹的鼎有如下一些。

## 1. 克利夫兰鼎



1



2

图一

1. 克利夫兰鼎,通高 57.4 厘米(引自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官网)

2. 子龚鼎,通高 47.3 厘米(引自 White 1956)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2003 年新收藏一件兽面纹鼎(图一,1),鼎通高 57.4 厘米,腹内壁铸有“天父□”三个铭文。该鼎的器形接近于夔鼎,腹壁稍稍弧曲,最大腹径靠下腹,与子龙鼎较直的腹壁、更低的最大腹径相比,年代特征显得略早。在布局上,该鼎纹饰更为接近夔鼎,兽面纹的两侧分别立有夔纹而不另设窄幅的兽面纹。不过在构图上风格则更接近子龙鼎,例如,该鼎兽面纹半浮雕的角、躯体更为夸张,躯体较为生硬且无夔鼎角侧那样的刚毛。

克利夫兰鼎的年代可能属于殷墟文化而不会晚至西周时期,这从该鼎纹饰的两个细节可以说明(图三,1):一是该鼎口下的兽面纹设半浮雕的两个眼珠,平面作椭圆形,但眼珠中未见下凹的长条形瞳孔。眼珠不带瞳孔是殷墟文化晚期之前的稍早青铜器特征,晚至妇好墓亚弜鼎(《全集》二、8)兽面纹也没有瞳孔,但子龙鼎、夔鼎则均见。另一个较早的特征是扉棱。克利夫兰鼎扉棱两侧设有多道较浅的凹槽,成为一种装饰,殷墟文化较晚时期及西周早期扉棱往往为台阶状,或者如子龙鼎、夔鼎那样,足部的扉棱作坡状凸起。

克利夫兰鼎在形制上既与子龙鼎、夔鼎接近,又表现出一些较早的细节信息,说明兽面纹大鼎的特征变化较为敏感,是当时社会较为前沿的产品。

## 2. 子龚鼎

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 或称 Bishop White)在作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东方部主任时,曾经著录过一件兽面纹鼎(图一,2),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子龚”(图八,2),铭文图形与子龙鼎颇为相似。不过该鼎此后未见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其他出版物和展览中,似



1

2

图二

1. 康普顿鼎, 通高 47.5 厘米(引自 Sotheby's London 2002, 11)

2. 坂本鼎, 通高 52.5 厘米(引自《中国青铜器清赏》图 51)

是已不再作为该馆藏品。

子龚鼎器形介于妇好墓亚弔鼎与戊嗣子鼎之间, 鼎的三足稍曲作兽蹄形, 显示出较为晚的时代特征。不过鼎的腹壁较直, 下腹到器底之间作圆弧过渡, 没有较晚兽面纹大鼎那样下腹外鼓的特征。鼎的三足兽蹄形不甚发达, 足部的扉棱也没有较晚鼎那样作坡状凸起。这样的特征说明其年代仍然属于殷墟文化晚期。

子龚鼎通高 47.3 厘米, 不过鼎的双耳、三足较为纤细, 器物形制并不显厚重。鼎饰一周三足长躯的兽面纹, 兽面纹构图与克利夫兰鼎类似, 兽面纹部件较宽厚而略显夸张。

### 3. 康普顿鼎

此鼎出现在苏富比伦敦 (Sotheby's London) 2002 年秋拍中 (图二, 1), 后归英国伦敦沃里克郡 (Warwickshire) 的康普顿 (Compton Verney) 收藏。康普顿收藏是海外的一家后起之秀, 二十一世纪拍下有不少重要青铜器。

康普顿鼎通高 47.5 厘米, 体量与一般兽面纹大鼎类似, 形制也具有一般兽面纹大鼎的特征: 口下和足上部装饰布局类似的兽面纹、设置类似的扉棱。但该鼎形制与一般兽面纹大鼎又有较大差异, 这表现在器形、纹饰和工艺等不同方面。

康普顿鼎突出的特点表现在纹饰上。与其他大鼎的兽面纹线条作宽带状不同, 该鼎兽面纹是由很细的阳线构成。我们现在已知, 细线的阳文是在陶范上直接制作而成的, 这在技术的难度上相对较为

简单, 因此是中国青铜器装饰手法上较早的特征。美国著名学者罗越正是根据这一特征, 将细线的阳纹作为商时期纹饰发展系列中最早的型。康普顿鼎兽面纹的确也表现出较早的特性, 例如该鼎兽面纹没有分化出明显的面部, 兽面纹两侧是类似二里冈文化或中商文化时期兽面纹那样的歧尾, 这暗示出该鼎的年代或早于殷墟文化时期。当然康普顿鼎阳线纹饰也未早至二里冈文化较早阶段, 因为这种阳线纹饰的使用延续了较长时期。中商文化时期出现的一些大型的兽面纹鼎如回民食品厂窖藏 H1 : 1 鼎 (通高 77.3、口径 52 厘米)、盘龙城杨家湾 M11 : 16 鼎 (口径 55 厘米、足残, 高度未知) 均饰阳线的兽面纹。这可能是因为器形较大, 故选择直接在范上简便地制作纹饰。实际上康普顿鼎口下兽面纹具有明确的范作特征, 我们不难注意到与足对应的兽面纹结合处, 两组兽面纹的幅面高度明显不同, 这说明两组纹饰在各自范上制作, 因此缺乏在模上制作纹饰那样容易保持的在高度上的一致性。

器形上康普顿鼎的耳、扉棱以及三足的线条弧曲, 双耳向顶部趋薄, 扉棱作浅而薄的月牙形, 不像其他兽面纹大鼎那样耳、扉棱为方形的横截面, 因此器形的外在表现力也没有那种雄壮的厚重感。这种差异应该与该鼎年代较早相关。

康普顿鼎的工艺特征明确。该鼎三足及其对应的腹部范缝明显, 范缝顺延着扉棱由口下贯穿至足根。值得注意的是足间的腹壁不见范缝, 再考虑到该鼎兽面纹中轴的鼻梁处未设扉棱, 暗示这件大鼎腹部的外范只有三块。另一方面, 该鼎每条鼎足内侧可见两条纵向的范缝, 又说明三足之间设有底范, 这是接近殷墟文化时期新出现的一个技术特征。

康普顿鼎的工艺特征明确。该鼎三足及其对应的腹部范缝明显, 范缝顺延着扉棱由口下贯穿至足根。值得注意的是足间的腹壁不见范缝, 再考虑到该鼎兽面纹中轴的鼻梁处未设扉棱, 暗示这件大鼎腹部的外范只有三块。另一方面, 该鼎每条鼎足内侧可见两条纵向的范缝, 又说明三足之间设有底范, 这是接近殷墟文化时期新出现的一个技术特征。

### 4. 坂本鼎

坂本五郎旧藏中另有一件兽面纹大鼎 (图二, 2), 通高 52.5、口径 40 厘米。此鼎所装饰的也是一周三组的长躯兽面纹, 纹饰作半浮雕凸起, 另外每条鼎足内侧可见两条纵向的范缝, 说明三足之间设有底范。按照该鼎这种纹饰和工艺特征, 其年代应该属于殷墟文化时期。但鼎的形制与其他殷墟文化大鼎差异明显, 在器形与上述的康普顿鼎颇为近似。

在装饰上, 坂本鼎也和其他鼎一样, 是在半浮



图三

1. 克利夫兰鼎口下兽面纹 2. 坂本鼎口下兽面纹一侧

雕的长躯兽面纹两侧加饰曲尾的夔纹,兽面纹的尾部向下内卷,纹饰构图尤其与克利夫兰鼎接近。不过坂本鼎装饰完全不加地纹(图三,2),这在典型的殷墟文化鼎中几乎不见同类器。鼎的兽面纹角端、嘴侧设有圆形乳突,这一特征又常见于殷墟文化时期南方青铜器。

坂本鼎的器形轮廓与其他大兽面纹鼎相同,但口沿较薄而不像其他兽面纹大鼎那样宽厚,特别是鼎耳向上趋薄、扉棱作浅而薄的月牙形、鼻梁处不设扉棱、与三足对应的腹壁处范缝清晰等等特征,都与康普顿鼎相同。坂本鼎形体高大,但三足对应的腹内平滑,没有像其他大鼎那样设有凹窝。这些特点说明此鼎与其他典型殷墟文化鼎文化背景不同。

坂本鼎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器表颇为粗糙。鼎腹壁内外均可见较多、较密集的气孔,有些气孔直径超过半厘米。这在典型的殷墟文化青铜器中也很罕见,相反,在殷墟文化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青铜器上多见<sup>①</sup>。我们知道,青铜器中如果含铅锡量过低或者是未加铅锡的红铜,铸造产品会产生大量气孔。在殷墟文化周边地区青铜器中,有不少是红铜器<sup>②</sup>。周边地区一些青铜器器表的大量气孔,当与这一情况相关。

坂本鼎以上特征,说明该鼎是一件殷墟文化时期周边地区产品,其产地极有可能是在南方的长江流域。我们知道,殷墟文化周边地区青铜器许多承袭了中商文化青铜器特点,坂本鼎与康普顿鼎器形接近,正是这

一关系的表现。这件鼎虽然品相很差,但学术价值反而较大。

#### 5. 报宾鼎

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藏有一鼎<sup>③</sup>(图四,1),通高40.5、口径33厘米,重15千克。鼎传陕西出土。腹壁铸有一行6字铭文:“报宾作父癸彝”,铭文也著录于《集成》2132。

报宾鼎的年代特征明确。在器形上,鼎的双耳横截面不再方直,而是接近圆形。口沿也伸出相应的圆唇,耳与唇面微显凸棱,这是许多西周圆鼎出现的变化。鼎腹部较直,下腹倾垂,是西周早期较晚或西周中期的典型特征。三足细而较长,也是西周早期鼎的新器形。鼎的兽面纹布局为三个长躯兽面纹夹三个窄幅兽面纹,颇为接近子龙鼎纹饰。不过报宾鼎兽面纹的爪、尾、鳍等部件伸出较多枝叶,这是西周早期兽面纹受鸟纹影响出现的新风格。总之,鼎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或早期偏晚,是大体无误的。

有趣的是,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当年研究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将族徽等铭文作为区别商与周年代的主要标准,由此产生许多错误。但基于此鼎铭文,他判断鼎的年代“可能是西周早期”,现在看来却是正确的。

#### 6. 得鼎

得鼎原为英国人何安达(Anthony Hardy)的思源堂所藏(图四,2)。何安达收藏艺术品家有渊源,他本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情有独钟,其中主要兴趣



图四

1. 报宾鼎,通高40.5厘米(引自 Karlgren 1952)

2. 得鼎,通高19.2厘米(引自 Rawson 1990)



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青铜器上。他的藏品曾经在香港艺术博物馆和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先后展出,并分别请罗森(Jessica Rawson)、李学勤等著名学者撰写展览图录<sup>⑭</sup>。2010年,何安达收藏的120多件青铜器曾在当年纽约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以超过2000万美元的价格创新世纪青铜器拍卖专场记录。

得鼎内腹壁有一铭文“得”,故名。鼎口下饰三组平雕的兽面纹。兽面纹纹带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云雷纹之间的留白,形成带状的兽面纹部件,如目、角、长躯、刚毛等等。这种风格的兽面纹常见于殷墟文化较晚时期其他青铜礼器,但在兽面纹大鼎中罕见。另一方面,得鼎形制与其他兽面纹大鼎几乎相同,鼎口沿、立耳、扉棱均造型厚实,单从图像上看,器体同样给人以厚重之感,但该鼎口径14.8、通高19.2厘米,体量实际上远较其他大鼎为小,而只是和一般常见小鼎类似。得鼎与一般兽面纹大鼎似是而非的特征,可能说明殷墟文化晚期兽面纹大鼎的发展,开始出现异化现象。

## 二

海外所藏一周六组兽面纹的鼎主要有如下一些。

### 1. 千石鼎

千石唯司的收藏中,另有一件兽面纹大鼎在2004年大阪美术馆展出(图五,1)。鼎内壁铸有铭文“丁□”。通高53、口径42厘米,重22.5千克<sup>⑮</sup>。该鼎口下一周饰六组相同的短躯兽面纹,底部及三足均有烟炆痕迹,这种痕迹在一些殷墟文化时期的

鼎上较为常见。此鼎腹壁弧曲,最大腹径在中部;三足上大小,兽蹄形不甚明显;扉棱较薄,两侧饰有浅槽。这些器形特征说明千石鼎的年代较早,器形特征最接近于妇好墓亚弔鼎和花园庄M54:240兽面纹大鼎<sup>⑯</sup>,说明其年代也大体相当于两鼎所属的殷墟文化第二期,而不是图录所订的“商末周初期”。

千石鼎的兽面纹为两层地纹夹半浮雕的三层花,纹饰构图为殷墟文化时期兽面纹所常见:兽面的鼻梁略宽于扉棱,鼻梁两侧设置椭圆形双目,双目上下分别是构图规整的“C”形角和一对尖锐的獠牙,兽面纹躯体也是沿双目左右水平展开,而后再上下歧分为卷尾和长爪。这类兽面纹,我们在下面谈到的几件大鼎上也能见到。

### 2. 𠂔鼎

为东京文明商会的旧藏<sup>⑰</sup>(图五,2),通高40.9厘米,腹内壁铸族徽符号“𠂔”。此鼎器形、纹饰无一不类似于千石鼎,年代亦当相同。唯器形稍小,无其他兽面纹大鼎的厚重感。

### 3. 白鹤𠂔辛鼎

白鹤美术馆收藏一兽面纹大鼎,通高43.6、口径34厘米(图六,1)。器腹内壁铸有两字铭文“𠂔辛”<sup>⑱</sup>。此器为白鹤较早的收藏,曾经著录于《日精华》<sup>⑲</sup>。

𠂔辛鼎与千石鼎形制非常接近。两器的兽面纹几乎相同,只是前者兽面纹幅面稍高,加之器体略小于千石鼎,这样使该鼎各组兽面纹的宽与高之比较小,相应地,鼎的兽面纹部件较窄而高,此外,𠂔辛鼎兽面纹的尾鳍也稍稍发达。两件鼎的细微



图五

1. 千石鼎,通高53厘米(引自《中国王朝の粹》第51页)
2. 𠂔鼎,通高40.9厘米(引自《日精华》图版200)



图六

1. 𠂔辛鼎,通高43.6厘米(引自《白鹤美术馆名品选》图16)
2. 子弔鼎,通高55.2厘米  
(引自《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中国の工艺》图16)

区别主要体现在器形上。夔辛鼎虽然形体略小,但口沿较厚,双耳上部趋宽,这样使鼎在视觉上显得更为厚实。另一方面,该鼎腹壁稍直,三足中段略束,初显兽蹄形。凡此诸点,说明夔辛鼎稍稍晚于千石鼎,但其年代仍然在殷墟文化晚期。

#### 4. 出光子 𠄎鼎

出光美术馆收藏一兽面纹大鼎(图六,2),通高55.2、口径41.5厘米,重33千克。这件重器是出光美术馆的重要收藏<sup>②</sup>,传于二十世纪初出于洛阳。鼎腹壁较为弧曲,下腹有黑灰色的烟炱痕迹。鼎腹内壁铸有两字铭文“子 𠄎”(图八,3),铭文亦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第1319条。

子 𠄎鼎的双耳、口沿、扉棱较厚,三足粗壮,显出厚重的器形。虽然只较千石鼎高不足3厘米,但重量超过了10千克,厚重的情况可见。鼎的兽面纹构图与白鹤鼎几乎相同,说明其年代也与后者接近。不过该鼎三足兽蹄形较为明显,弧曲的腹部也不似妇好墓亚弜鼎风格,其年代应该略晚,或在殷墟文化末期。

#### 5. 山父丁鼎

山父丁鼎为纽约华裔收藏家范季融伉俪的首阳斋所藏<sup>②</sup>(图七,1),他们的收藏曾经在海外多地展出。2008年上海博物馆和香港大学文物馆分别展览之后,出版有图录和研讨会文集。山父丁鼎器形略似于白鹤鼎,腹壁微弧,三足略显纤细,只是山父丁鼎体量明显较小,通高32.8、口径27厘米,重8.03千克。山父丁还作有盘,也为首阳斋所藏。

山父丁鼎也是一周六组相同的兽面纹,与前面的几件鼎兽面纹相比,纹饰风格和基本结构相同,只是在细部构图上有所差异。例如山父丁鼎兽面纹的鼻梁伸展到与扉棱上下平齐,双角的角尖不是同时向下,而是相对而侧立,兽面纹的尾部和爪较为粗壮,这些变化显示其稍晚的年代特征。不过此兽面纹尚无西周时期兽面纹那种枝叶繁茂之感,年代似乎仍然属于殷墟文化时期。

山父丁鼎通高不足33厘米,尚不能称之为大鼎。该鼎口沿较薄,足径较细,体量较为轻薄。和前述的得鼎一样,这种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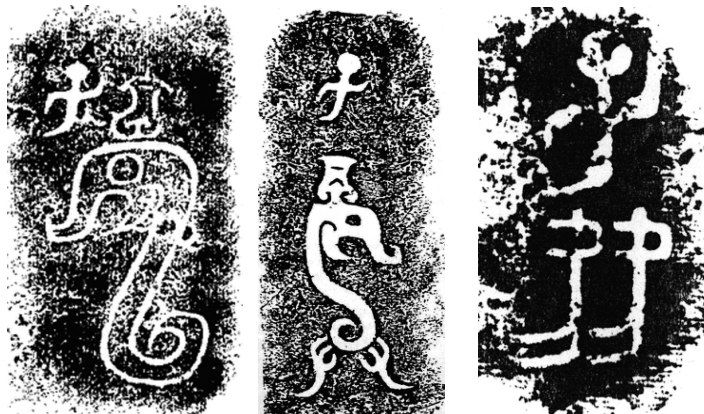
1. 山父丁鼎,通高32.8厘米(引自《首阳吉金》图25)
2. 甬陵鼎,通高41厘米(引自《友邻馆精华》图版3)

较小的体量说明兽面纹大鼎在发展中,异化出较小、等级较低的一类。

#### 6. 友邻馆甬陵鼎

鼎为京都友邻馆藏藏品<sup>②</sup>(图七,2),通高41厘米。器内壁铸有铭文二行6字:“甬陵作宝尊彝”,亦著录于《集成》2178。传出于浚县辛村。

鼎的年代应该较晚。鼎双耳横截面接近圆形,耳做成与绳股近似的形状,是西周早期开始在鼎与甗的器耳上常见的作法。腹部宽扁而倾垂,为西周中期圆鼎典型器形。口下饰六组相同的兽面纹,每组兽面纹的躯尾都已与兽面分离,构图近似于大孟鼎的兽面纹。兽面纹各个部件尖而曲的枝枝较多,这种风格也是西周早期稍晚时出现、较大孟鼎为晚的特征。总体来看,鼎的年代大约在西周中期偏早。



图八

1. 子龙鼎铭文
2. 子龚鼎铭文
3. 子龚鼎铭文

豳鼎在兽面纹大鼎中属于年代较晚者。兽面纹大鼎发展到这一阶段,适逢西周中期开始的礼制变革所引起的青铜器风格转型。此后,兽面纹大鼎不见,其风格的遗子,偶尔会出现在一些重器中。

口下和足上饰兽面纹和扉棱,从豳鼎、子龙鼎到其他兽面纹大鼎,这种形制几乎为商周之际前后大型圆鼎所广泛采用。在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高峰阶段,在这个青铜器形制变化具有极度多样性的时期,却在大型圆鼎上表现出颇为高度的一致性。是什么样的背景形成这样的一致性?这是值得专门研究的。

最后附带谈谈兽面纹大鼎的徽类铭文(图八)。在子龙鼎的专家专论中,不少先生已经就“子龙”铭文的涵义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可能包括私名和族名两种可能。一般而言,两个符号构成的青铜器徽类铭文多表达族徽一类涵义,但带有特殊字符组成的徽类铭文,如“亚某”、“子某”,“亚”或“子”可能表有身份或职官的信息。就本文涉及的铭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子龙”、“子龚”、“子𠄎”等内容,其中的“龙”、“龚”不仅图形相似,且分别又见于其他一些青铜器。因此他们似乎表达某些特殊的族群的可能性较大一些。

注释:

<http://www.clevelandart.org/collections/collection%20online.aspx?type=refresh&searchoption=1&csearch=Department:Chinese Art>. 该鼎尚未展览和出版。

White, William Charles,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ronze Objects from Northern Honan, Dating from about 1400B.C. - 771B.C.* p. 15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Royal Ontario Museum, *Homage to Heaven, Homage to Earth, Chinese Treasures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Royal Ontario Museum: The T.T.Tsui Galleries of Chinese Art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徐展堂中国艺术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1996.

Sotheby's London, November, 13th, 2002.

Max Loehr,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1300-1028B.C.)*,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953,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一七,文物出版社,2001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张昌平等:《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造型技术的发展》,《文物》2010年第8期。

难波纯子:《奈良国立博物馆藏品图版目录·中国古代青铜器篇》第51页,奈良国立博物馆,2005年。樋口隆康、林已奈夫监修,难波纯子编辑:《不言堂坂本五郎中国青铜器清赏》第84页,日本经济新闻社,2002年。在奈良馆的图录中,该鼎通高数据为52.2厘米。

张昌平:《北美地区所见中国商时期南方或南方特征青铜器》,罗覃主编:《全球化背景下考古学新前沿:解读中国古代传统》,AMS艺术、科学和人文基金,2008年。

⑪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与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⑫ 陈坤龙:《陕西汉中出土商代铜器的科学分析与制作技术研究》,第113~117页,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⑬ Karlgren, Bernhard, *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fig.9, Vol. 24, 1952. Stockholm.

⑭ Jessica Rawson & Emma Bunker,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Presented Jointly by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Urban Council of Hong Kong at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12 October to 2 December 1990*.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Hong Kong. 1990. 李学勤:《中国青铜器萃赏》(中英文),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0年。其中得鼎分别见于两个图录的第21器和第151页。

⑮ 难波纯子:《中国王朝の粹》,第51页,北星社,2004年。

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彩版12,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⑰ 内藤干吉:《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第200器,山中商会,1961年,大阪。

⑱ 白鹤美术馆:《白鹤美术馆名品选》图16,便利堂,2000年,京都。

⑲ 内藤干吉:《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第199器,山中商会,1961年,大阪。

⑳ 出光美术馆:《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中国の工艺》图16,平凡社,1989年,东京。杉村勇造:《中国古铜器》第74~79页,出光美术馆,1966年,东京。

㉑ 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首阳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山父丁鼎在图录第25器。

㉒ 友邻馆学芸部:《友邻馆精华》图版3,艸艺社,2003年,京都。内藤干吉:《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第201器,山中商会,1961年,大阪。

(责任编辑:周广明)